

## 苏曼殊性心理初探

曾焯文

本文拟应用 Melanie Klein 和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概念来解析诗僧苏曼殊（1884-1918）性心理中一些令人困惑的方面。所采用的 Klein 理论包括妄想——分裂及躁狂——忧郁状态、好母与恶母形象、父母联合体、补修倾向等；所采用的佛洛伊德理论包括伊底帕斯情意结。本文作者认为不愉快的童年经验——因父亲关系而自幼与生母、姨母分离，被后母虐待等——在曼殊潜意识中形成一个令他极度依恋的理想化母亲，一个令他异常嫌恶的恶母，以及一个令他愤恨忌惮的父亲。这些有问题的父母心象导致曼殊带有自毁性质的大食症状、三次出家以至性无能。另一方面，上述病态倾向为一强而有力的补修或升华倾向所制衡，此种倾向表现于曼殊缙画的主题、其小说的三角恋模式、其广阔交游，爱国热情以及无政府暗杀主义等。

未开始分析曼殊之前，且先简介 Klein 和佛洛伊德的几个心理分析概念。

Klein 发现了两种婴儿状态——妄想状态与忧郁状态。人每当压力大时，便倾向倒退至这些状态。妄想状态主导婴儿前三个月之生命，其时婴儿将母亲乳房（以至父亲阳具）分为好母与恶母，每当不适则在幻想中全力袭击恶母（父），因而惧怕其报复性的迫害。由四个月大开始（至一两岁），婴儿发现好母（父）与恶母原属一人，因而进入了忧郁状态，担心对恶母（父）之袭击同时伤害了好母（父），感到非常内咎。此情况之解决有赖婴儿整合对同一客体

（母父）的爱和恨，在幻想及现实中弥补受创伤的好客体，好母父（Klein,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Infants” 198-236）。

佛洛伊德则发现男孩到了两三岁便进入阳具发展期，对母亲产生性爱感觉，不时在她面前玩弄性器官，企图借此挑逗之；而父亲则变成碍手碍脚的情敌，令男童意欲除之而后快，这就是所谓「伊底帕斯情意结」的内容。不久，男童母亲会觉得不宜再让儿子挑逗她，遂威胁要让父亲阉割男孩，这威胁本身说服力不大，可是若在事前或事后男童看见缺乏阳具的女性器官，他就会重视有关威胁，经验其幼嫩生命的最严重创伤——阉割情意结。为了保存阳物，男孩只好将母亲的爱欲化为温情，将对父亲的妒恨化为敬畏，将整个伊底帕斯情意结压入潜意识之中（Freud 1：416-18，7：334）。

曼殊不愉快的童年经验造成他对恶母心象的惧恨，对理想化母亲的痴恋、以及对恶父形象的仇恨。

曼殊的童年创伤可分为两大种。第一重创发生于曼殊三个月大时。话说曼殊生父苏杰生是广东人，清末在日本横滨经商时纳日妇河合仙为妾，曼殊生母河合若是河合仙胞妹，初为杰生下女，后为杰生诱并成孕。河合若产下曼殊不足三月，因接伊父家书，遂返日本乡下，永不归来（柳亚子，《苏曼殊研究》168-69）。河合若走后，曼殊由和善的河合仙抚养。而据曼殊侄苏绍贤言，曼殊襁褓时体弱多病，「几死者屢」（引自柳亚子，《苏曼殊研究》2-8）。从心理分析角度出发，一个人三个月大时，其毁灭性冲动、分裂<sup>1</sup>和投射皆达到巅峰，而曼殊（我假设）仍亦不例外。在这个 Klein 称之为妄想—分裂状态的时期，过早的断奶、失去母亲以及体弱多病令曼殊过度分裂母亲乳房为好、坏两方面。他将大量毁灭性冲动投射进恶母乳房（对照 Klein, Love, Guilt and Reparation 306）。一个凶残无比的吃人母亲心象，结果形成于曼殊潜意识之中，终身干扰他的事业、爱情以及各种升华努力。

<sup>1</sup> 将客体或自我分为好、坏两方面。

曼殊的恶母心象可见于其行文中不时流露出的对女性的强烈歧视和仇视（尽管曼殊大体上是个惜花之人，在秋瑾诗序及译乐宛诗的注文中都对女子有正面之评价。）例如1915年他给柳亚子的信中有云：「若夫女子留学，不如学毛儿戏」（苏曼殊1：65）。《碎簪记》中的「余」曰：「天下女子，皆祸水也！」（苏曼殊1：200）。〈娑罗海滨遯迹记〉说女人的坏话更多，甚么「女人为助恶因，能断善种，外貌柔媚，内心伎恶。物之可畏，莫女人若：毒蛇害肉身，女人害法身。女人多嫉忌。以此因缘，女人死去即生饿鬼趣中。女人为地狱使者，使发美言，即是喷毒」（苏曼殊2：757）。诸如此类俱反映出曼殊对于恶母/妻心象的妄想被迫害态度。

与曼殊恶母心象深深分裂开来但又同时存在的是理想化母亲心象。曼殊的理想化母/妻形象可见于其小说诗歌创作。小说方面有《断鸿零雁记》中「高抗无伦，容华绝代」的雪梅和「翛然出尘，如藐姑仙子」的静子（1：100）；《碎簪记》中「风致如仙人」的杜灵芳（1：199）和「容光靡绝，丰韵娟逸」的莲佩（1：202）；《绛纱记》中「容仪绰约，出于世表」的五姑（1：160）等等。她们不单美丽过人，学养俱全，而且对所爱男主角（以曼殊代表）死心塌地，不惜以身殉情。代表理想化母亲/妻的天女也常出现于曼殊的诗歌中。例如「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属题诗」（1：20）；「相逢天女赠天书，暂住仙山莫问余」（1：24）；「偷尝天女唇中露」（1：29）等。

曼殊的第二童年创伤发生于他五岁时。由于杰生的中国妾侍大陈氏和河合仙不和，河合仙和曼殊一向相依为命，并不住在苏家。曼殊五岁那年，杰生为了壮旺人丁，硬将曼殊从一直抚养他的河合仙处抢过来，让大婆黄氏携曼返回原籍沥溪。实行要子不要娘。在沥溪，家中大部份亲属经常歧视曼殊，以其无母兼有日人血统之故也（柳亚子，《苏曼殊研究》373，501）。1892年，二婆大陈氏偕杰生回乡，对曼殊更颇有虐待之嫌（同上58，170）。闻曼十二岁在乡居，偶患疾病，竟有婶婶辈预定其病不能治，弃之于柴房以待毙

（同上 505）。根据佛洛依德发现，五岁是男孩恨父恋母情意结之极至，杰生在此时把曼殊和爱惜他的河合仙拆散，留曼在原籍家中给人虐待歧视，势必固置曼于恋母恨父期当中（对照 Freud 15：143, 310, 385-86）。而曼殊童年在乡间所受后母及婶婶的虐待则很可能使曼殊之恶母心象更形恶化。

曼殊对于杰生的敌意，在曼殊自称日本种以及拒绝回家奔父丧二事上表露无遗。

曼殊在《潮音跋》中明白声称原名宗之助，自幼丧失「王父忠郎」，「依太夫人河合氏生长江南，五岁别太夫人，随远亲西行支那」（1：309-11）。柳亚子虽然推测河合仙必定没有告诉曼殊杰生与河合若私通而产曼殊的真相，惟仍以曼殊平时言行，非常拥华反日，「决不会凭空以承认日本日统为光荣」，断定〈潮音跋〉是曼殊精神病的产物（《苏曼殊研究》276）。余亦有同感。曼殊潜意识中大概宁愿有个早故的日父，也不愿认冷漠专横的杰生为父。

1904年，曼殊旅居香港，一名同乡受身在沥溪的杰生所托，来港找曼殊，告知曼殊杰生病重，要求曼殊回家，但曼殊以阮囊羞涩为由拒之。两天过后，杰生去世，而曼殊亦一直没有回去奔丧甚或拜祭（柳亚子，《苏曼殊研究》172），足见他对杰生的恩断义绝。

上述有问题的母父心象可能导致曼殊的自毁大食症状以及性无能 and 三次出家。

现在让我们先检视曼殊的大食症状，然后再分析其心理机转。柳亚子说：「曼殊生平最喜吃，尤其喜吃糖果，可可糖、粽子糖、八宝饭，都是他的必需品。他又喜吃雪茄烟。曾听人说，他在日本时，有一天雪茄完了，可是没有钱，他便将口中的金牙齿拿下来去变钱买雪茄」（《苏曼殊研究》350）。「日食摩登糖三袋，谓是茶化女酷嗜之物」（同上 424-425）。曼殊不单在现实中馋咀，就在梦中亦如是。1911年他从爪哇写信给柳亚子说「昨夕梦君，见膝上蒋红字腿、嘉兴大头菜、枣泥月饼、黄罍糟旦各事，喜不自胜。比醒，则又万绕悲凉，倍增归思」（苏曼殊 2：534）。1914年于日本寄何

震生书又曰：「今日为元旦，肠疾缠绵，凡百俱癯矣。除夕梦至海上吃年糕及八宝饭」（苏曼殊 2：588）。

据余分析，河合若在曼殊生后三月，即给他断了奶（李蔚 5），离他而去，致使他固置于口腔期或吃人期（对照 Freud 7：116-17），在成年后，不得不躁狂地暴饮暴食，以充份补偿，甚至是过份补偿，襁褓时求之不得的母乳；换句话说，曼殊经常不由自主地吞纳代表好母的食物，一方面是为了担忧曾经贪婪地咀嚼掉好母——重复此行为以证其忧虑之虚妄——另一方面是为了惧怕内化了的恶父恶母，需要代表好母的食物来助他对付这些坏客体（对照 Klein, Selected Melaine Klein 119），此外曼殊的口腹之欲又与性快感挂勾（对照 Freud 9：347-49）。具体而言，曼殊所嗜食的摩尔登糖代表来自理想化母/妻茶花女的性满足。茶花女国色天香，但由于交际花的出身面自惭形秽，被迫离开心爱个郎亚芒，终于忧郁而卒；河合若则由于身为下女，不得进入苏家，诞下曼殊复数月即被迫离去。据佛洛依德发现，自我失去所爱对象之后，通常透过认同失去的对象来寻求替代（对照 Freud and Bullit 90）同样道理，曼殊仿效茶花女嗜食摩尔登糖，是为了认同或吸纳食下此理想化母/妻，并且从糖味中重温当年享用河合若母乳时所得之性满足。曼殊老友陈陶遗就曾亲见曼殊大嚼摩尔登糖时「一幅心满足的…憨态」（李蔚 152）。

虽然曼殊的大食为他带来不少快感，但同时也带他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1911年，费公直在东京巧遇曼殊，当日，「大师欲得生…鲍…遣下女出市。大师啖之不足，更市之再，尽三器，余大恐禁弗与…憩根津神社…是夕夜分，大师急呼曰：『不好，速为我秉火，腹疼不可止，欲如厕。』遂扶之往，暴泄几弗及登。发笈授药，次日愈不能兴，休二日始行」（柳亚子编，《曼殊全集》4：132）。1914年，曼自日寄邵元冲书曰：「午后试新衣，并赴源顺，食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小碗，苹果五个。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同上 4：343）。章炳麟亦曾透露曼殊「尝在日本，一日饮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动，人以为死，视之犹有气。明日复饮冰如故」（同上 4：

77)。又据黄季刚提供的材料，「大师居沪上，有人要大师一次食尽肉包子六十枚之为胜者，师竟食之，遂卧病数日而终。方师食至五十余时，友人尼之，欲无尽食，盖此物食过多，则难万一消化也，师坚执不可，几至决裂，且食后又进咖啡一杯，遂不得不颓然下榻矣」（柳亚子，《苏曼殊研究》330）。

甚至在病情严重时曼殊仍然不顾死活，违背医生的禁令，放恣口腔之欲。例如他在1914年1月致陈陶怡信中有云：「连日背医生往亲友家大吃年糕，病复大作，每日服药三次。足下试思之，药安得如八宝饭之容易入口耶？」（苏曼殊2：585）。又曼殊病危时，友人周然去医院探他，听见他埋怨医生看护不周，便和院长交涉，「院长出糖栗三四包示予，反责曼殊之不遵所戒，私食禁忌之物，此由彼枕畔搜得者，犹望其疾之速愈耶？」（柳亚子，《曼殊全集》5：251-52）。结果，曼殊终于狂泻而死。1917年12月住上海广宁医院时，「夜间尚泻三四次，或一之二次，视空气中之温寒以为向背」（苏曼殊633）。1918年3月迁广慈医院，日泻五、六次，不能下地（同上635）。

据吾人分析，曼殊的暴饮暴食是一种带有忧郁症色彩的慢性自杀，最终目的是为了铲除挫败自家童年口腔欲的恶母心象（对照 Klein, *Selected Melanie Klein* 131-32）。曼殊挚友陈独秀说得好：「曼殊的贪吃，人家都引以为笑柄，其实正是他的自杀政策。他眼见举世污浊，厌世的心肠很热烈，但又找不多其他的出路，于是便乱吃乱喝起来，以求速死；到底成功了不可救药的肠胃病死去」（柳亚子，《苏曼殊研究》281）。

佛洛伊德发现忧郁症患者倾向自杀，是由于他们视自家为某一客体，将对于该客体的恨意发泄在自家身上（对照 Freud 11：261）。同样道理，曼殊暴食求死是为了袭击内在化了的恶母以至令人失望的母国。根据心理分析大师 Melaine Klein 的理论，每个人由婴儿时期开始均逐渐把爱意从母亲身上转移至其他事物，故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母国（Mother Country）可能代表着我们的母亲（Klein, *Love, Guilt*

and Reparation 333)。在曼殊的年代，满清皇朝腐败无仁，中国迭遭列强入侵，西方文化冲击，无疑，辛亥革命的胜利曾令曼殊欢欣欲狂（柳子无忌 3），然而革命成果旋遭袁世凯掠夺，袁某称帝失败后又有张勋复辟、军阀割据，而革命党人本身的腐化倾向亦开始呈现，结果是海内鼎沸，民不聊生，在曼殊心目中直把中国变成危险之母体子宫（对照 Klein, *Love, Guilt and Reparation* 376）。

除了自杀性大食症征状外，曼殊有问题的母、父心象又导致他的性无能以及三次出家。

吾人基于下面的理由认为曼殊患有性无能。第一，曼殊热于恋爱，但一讲起结婚就怕。例如 1899 年，「曾随河合仙去逗子樱山村，与一日本少女相恋。失恋后，回广州，在浦涧寺出家。」（李蔚 465）。又如 1904 年，他在香港拜访其西班牙恩师庄湘博士，庄湘欲把女公子雪鸿嫁给他，他流泪说：「吾证法身久，辱命奈何？」庄湘乃资助他往游南洋诸佛圣地（苏曼殊 1：310）。那位雪鸿小姐和曼殊的感情是很深厚的。在题为《题拜伦集》的那首诗前面，有这样的序言：「西班牙雪鸿女诗人过存病榻，亲持玉照一幅、《拜伦遗集》一卷、曼陀罗花共含羞草一束见贻，且殷殷勸以归计，嗟夫！予早岁披剃，学道无成，思维身世，有难言之恫。奚扶病廿八字于拜伦卷首，此意惟雪鸿大家心知之耳」（苏曼殊 1：37）。又如 1909 年，曼殊在日本和讽箏歌伎百助热恋，曾赋诗曰：「华严瀑布高千呎，未及卿之爱我情」（1：20），可是到头来曼殊始终要「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1：20）。再如 1923 年，曼殊在上海大吃花酒，热恋名妓花雪南，但照例不能与她共谐连理。据李蔚说，「曼殊一向认为：与其结为百事可哀的夫妻，招尤致怨，倒不如各归四海，反留得后时回味。曼殊在爱情中这种欲行不得，欲罢不能的徬徨情绪曾表达于以下诗句：『何处停依油壁车，西冷终古即天涯』。意谓「你的油壁车还能停留在那里呢？要知道我俩的关系已经天涯梦断，西冷终古了」（李蔚 333-34）。



某年，曼殊有事于沪，昵一妓，深爱之。究有暇，辄顾其家。既且寝于斯，食于斯，衣服杂用之物，咸置其处，几视妓家如己室；与妓之同食共枕，更不待言，而终不动性欲。妓以为异，问其故，则正容而语之曰：『爱情者，灵魂之空气也。灵魂得爱情而永存，无异躯体恃空气而生活。吾人竟日纒纒，实皆游泳于情海之中。或谓情海即祸水，稍涉即溺，是误认孽海为情海之言耳。惟物极必反，世态皆然。譬之登山，及峰为极，越峰则降矣。性欲，爱情之极也。吾等亘爱而不及乱，庶能永守此情，虽远隔关山，其情不渝。乱则热情锐退，即使晤对一室，亦难保无终凶已。我不欲图肉体之快乐，而伤精神之爱也。故如是，愿卿卿与我共守之。』（柳亚子编，《曼殊全集》5：261）

刘心皇认为，曼殊正当精力十足的壮年，与妓女同床共枕，竟然不动性欲欲。「这已不是禅定的问题了…其实，曼殊是患了性无能的病，对女人心有余力而力不足，他在妓女堆中混竟然不起性欲，这不是小事情，因为妓女是受过训练的，有专门叫人起性欲的技术，而曼殊竟然不起，便确定是患了性无能」（135）。

至于曼殊的出家，次数就起码有三次之多。据马以君编的苏曼殊年谱，1900年，曼殊在日本求学期间，「尝自感身世，潜回广东流浪至新会县涯山慧龙寺投贖初大师剃度」。1903年，「回广州寻师不遇，在一破庙，拜一老僧为师，窃取师父银洋二角，经东莞赴港，重住中国日报社。」1904年，自港赴南洋诸国体察当地僧侣生活，曾受戒于左臂上（796）。

根吾人分析，苏曼殊的性无能和三次出家大概有下列三种心理成因：

第一是对于理想化母亲的忠诚。从上述曼殊的性爱二元论中，可知曼殊以精神之爱（或温情）为贵，以性欲为轻。据佛洛伊德发现，男孩对于母亲的感受是性爱不分的，后来到了五岁，由于阉割威胁，以至伊底帕斯情意结的分解，男孩对母亲的性爱才遭压抑，只余温情。及至青春期，性爱重新倾向合流，惟碍于乱伦屏障之形



成，只可灌注在家庭以外的对象。然而，部份男性由于在潜意识中过份痴恋母亲<sup>2</sup>，以致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和任何客体有爱又有性（对照 Freud 7：119）。曼殊正是这种人——太过忠于河合若（与河合仙？）的理想化心象，以致与其他女子只能有爱而不能有性<sup>3</sup>，并且必须假借出家来逃避性生活。

第二是对恶母心象的惧恨。正如前述，曼殊三个月大，痛失生母时，可能愤而在幻想中袭击恶母，因而担心被她复性吞噬（Klein, *Selected Melanie Klein* 116, 186），使此恶母心象更形恶化的，是曼殊五至十二岁期间在家乡及上海所受后母大陈氏及其他婶婶辈的凌辱。

再者，列强的入侵、腐朽清廷对革命份子的残酷镇压、袁世凯的穷国篡权，陷害忠良、军阀的争夺地盘，可能在曼殊潜意识中代表了恶父阳具穿插母亲体内，化之为—备受荼毒而有害之地。童年母乳不足的创伤被唤起的同时，曼殊可能潜意识地与恶父认同，暴虐性入侵母国，因而害怕母亲心象之报复，幻想在母亲体内丧失阳具，结果导致性无能，以及母—妻化为恶母，正与恶父私通谋害自己（对照 Klein, *Selected Melanie Klein* 86, 88, 96, 208-09）。

曼殊逃禅避性的第三个心理成因应为对生父的忌惮。据佛洛伊德分析，秃头和削发在梦中通常象征阉割（4：474）。吾人以为曼殊屡次出家，是象征自我阉割，以顺从伊底帕斯式恶父，避免与他争夺母/妻。

2 曼殊对于乃母的依恋清楚见于《断鸿零雁记》和曼殊遗言。在《断》中，曼殊化身三郎常垂泪曰：「人皆谓我无母，我岂真无母耶？…常于…百静之中，隐约微闻慈母唤我之声…吾母生我，胡弗使我一见？」（苏曼殊 1：74）。再者，曼殊临终时道：「惟念东岛老母，一切有情，都无罣碍」（柳亚子，《曼殊全集》4：97）。

3 曼殊性压抑的另一旁证是他对性的无知。有一天，他问章太炎：「子女是从何而来？」章答：「这个问题，我坊间讲述男女卫生新论之书，读之即得，何必问我？」曼殊说：「不然，中西书籍都说需要有男女媾情才能生子，而事实上却有例外：我乡有一妇女，其夫三年不归，她照样生育，这岂不是女子不需要男子也可以单独生子的证明吗？」众人听说，无不微笑；章太炎亦默不作答。曼殊看到众人被他难倒，益发得意（李蔚 153）。

另一方面，曼殊的病态倾向得一强劲有力之补修倾向制衡，此倾向表现于曼殊的文艺创作、其广阔交友、爱国热忱以及政治主张。

曼殊主要通过创作自叙体小说和画作自救。透过和谐的文艺形式充份呈现自家妄想与忧郁幻想和焦虑的恐怖，他弥补心中受损的好客体，以及重整混乱的内心世界（对照 Segal 400）。

在画中，曼殊至喜描绘的景色，套用柳无忌的话，「是峰峦、危岩、孤松、垂柳和残月，加上荒凉的城垣、远方的宝塔或庙宇、茅舍或断桥」（柳无忌 164）。诸如此类，皆代表曼殊破碎而忧郁的内心世界。而曼殊画作的人物中每多受损害、受侮辱的女性，例如〈葬花园〉画的是千古伤心人林黛玉（柳亚子，《曼殊全集》5：285）；〈文姬图〉画的是一名以袖掩面饮泣的女子（同上 4：327）。这些女性大概代表曼殊受损而堪怜的好母心象。

至于曼殊的小说，则采用三角恋的悲剧公式来重现曼殊幼年失去两位慈母的惨况。例子是〈断鸿零雁记〉中的三郎、静子和雪梅；〈碎簪记〉中的庄湜、杜灵和莲佩；〈非梦记〉中的燕海琴、薇香和凤娴。

以上几篇小说的模式都是两名绝代佳人先后与男主角发生恋爱，可是由于家长的阻挠，与乎男主角的逃禅，二女皆不能与男主角长相厮守，最后或郁郁而终，或自寻短见。此二女的原型当为曼殊失去的生母或姨母，他们在《断鸿零雁记》中可谓「原型毕露」。原来三郎日母留下小三郎在中国，独自东归后多年，三郎方查得其地址，赴日与之重逢。回家第三日，三郎偕母往箱根访姨，而姨母对三郎关切之情并非一般姨母姨甥关系可比。很明显，三郎日母是指河合仙，姨母是指河合若。

曼殊另一补修方法是博爱多友。其友好柳亚子曰：「海内才智之士，鳞萃辐凑，人人愿从玄瑛遊，自以为相见晚；玄瑛翱翔其间，若庄光之于南阳人焉」（《苏曼殊研究》20）。套用柳无忌的话：「如果把苏曼殊的友人一个一个名字排至我们的脑筋里，这差不多成了一幅民国以来文人名士的缩影图」（马以君，前言 37）。

佛洛伊德认为，人在丧失了所爱对象之后，会倾向于与之认同。据笔者分析，曼殊在痛失生母与养母之后，把自己代入她们<sup>4</sup>，像她们爱自己一样去爱其他男性（对照 Freud 14: 191）。透过聚集一大群好友，曼殊为自家重建造一个永不衰竭，永不令人失望的母亲乳房。但这需要带有躁狂性质，暗示曼殊内里缺乏自信，不能自给自足（对照 Klein and Riviere 24-25）。

曼殊的补修倾向又见于其政治主张。曼殊早年是个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以暗杀手段除暴安良，挽救中国。远在 1903 年，于东京参加军民教育会时，他即企望当杀手，为了当杀手，他摸熟军器，苦练射御，钻研易容之术。同年，他在上海《国民日报》发表《女杰郭耳缦》以及半译半创作的《惨世界》。《女杰》叙述一名由俄国移居美洲的女子郭耳缦如何向一名美国男子灌输无政府主义思想，成功鼓动他去刺杀美国总统麦坚尼，文章中还介绍了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暗杀欧洲各国贵胄的连串轰烈事迹。在《惨社会》中，法国大侠明男德用大刀把恃势横行的村官满周苟（满洲狗的谐音）腰斩之后，又愤于大总统拿破仑妄图称帝奴役百姓，于是伙同同志克德前往巴黎行刺拿氏，可惜失败成仁。1904 年，曼殊住在香港陈少白所主持的《中国日报》报社时，康有为鲸吞掉海外华侨捐助党人的一笔巨款，寓居云咸街养尊处优，后有起义失败的哥老会龙头杨洪钧落难香江，向康某告贷盘川回沪，詎料康某不但不见杨氏，还纵容守卫殴打他。曼殊闻说此事，当堂义愤填膺，天真地问陈少白借用手枪，声称要射杀康某，陈少白自然婉拒曼殊，令他感到十分沮丧（李蔚 89-90）。何士夫认为曼殊欲当刺客，除了是受了时代风气影响之外，最主要还是由于暗杀对象象征其父杰生。

长久以来，曼殊皆隐隐若若觉得他从幼年到成长期的种种苦痛都是乃父对二母始乱终弃，对曼三冷漠专横所造成的，所以他立志

<sup>4</sup> 曼殊与日母的认同或其女性化可见于他一九一三年划的〈雪蜨倩影图〉（现归星洲潘受教授）。图中为一身穿和服的清秀日女，可雪蜨明明是曼殊其中一个别名（柳无忌，《曼殊全集》5：159），所以图中倩女不就是曼殊本人内化了的理想母亲吗？

要做个大刺客。无疑他不会真的干掉老爹，只是意识不容他如此做。然而，「谁能否认，当他在想像中品尝暗杀的快感时，也隐含了摧毁父亲的权威的狂喜？他的恋母倾向非常明显，而恋母与憎父往往成正比」。潜藏的弑父者暗杀无道权贵，一方面可以为民除害，名垂青史，另一方面又可堂而皇之的发泄对父亲的仇恨，真是一箭双鵰啊（何士夫 73）<sup>5</sup>。

尽管曼殊早年的无政府主义暗杀主张犯了盲动的错误，但其爱国精神仍不失为一种健康的倾向。青年留日时，曼殊即已先后参加爱国革命组织如青年会、抗俄义勇军、国民教育会。自从袁世凯窃国称帝、张勋复辟、军阀割据之后，曼殊开始自暴自弃，过着颓唐的生活。然而，1917年11月中山先生正在筹谋誓师北伐之际，曼殊虽已病重，仍思早愈返粤尽其天职（柳无忌 4），可见伊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窃以为中国对曼殊来说代表母亲，为保母国不受恶父蹂躏，他与外敌及内奸誓不两立。例如在《断鸿零雁记》中，他指责传教士多「包藏祸心，思墟人国（1：87）」，又如在〈讨袁世凯宣言〉中，他痛骂世袁贼祸国殃民，誓要取其狗命（1：323-24）。

总括来说，曼殊的性心理困境不单是个人的，同时也是当时国人的。盖清末民初之际，各种内忧外患，包括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列强瓜分、辛亥革命、袁氏窃国、张勋复辟、军阀内战，在其人民心目中直把中国变成一饱受恶父阳具蹂躏、充满危险之母体子官（对照 Klein, *Love, Guilt and Reparation* 375）。无怪当时国人，特别是爱国而看不到出路的知识份子<sup>6</sup>，皆神经兮兮，充满焦虑、恐怖、忧郁和不安。曼殊的病态倾向只不过是把上述国民心态放大而已。幸好，正如曼殊能够透过艺术创作和爱国热忱修补其受伤之母亲心象，吾人有理由相信中华民族的韧力最终足以重整受伤的内在母亲，慢慢建立起一个繁盛开放的母国（曾焯文 42）。

<sup>5</sup> 何士夫对于曼殊伊底帕斯情意结的分析与佛洛伊德对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心理分析遥相呼应 (Freud 14：450)，颇合情理。

<sup>6</sup> 例如蹈海自杀的陈天华、口吃艾艾的柳亚子、以及具有妒忌妄想倾向的郁达夫。

- 何士夫。《心魔·苏曼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 李蔚。《苏曼殊评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
- 马以君。前言。《苏曼殊文集》。苏曼殊作。马以君编。26-52。
- 马以君。〈苏曼殊年谱〉。苏曼殊 781-825。
- 柳无忌。《苏曼殊传》。王晶垚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
- 柳亚子编。《曼殊全集》。上海，1927；翻印。北京：中国书店，1985。
- 柳亚子。《苏曼殊研究》。柳无忌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曾焯文。〈社会身体学与中国文化〉。《文艺报》2（1995）：40-42。
- 苏曼殊。《苏曼殊文集》。马以君编。两册。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

